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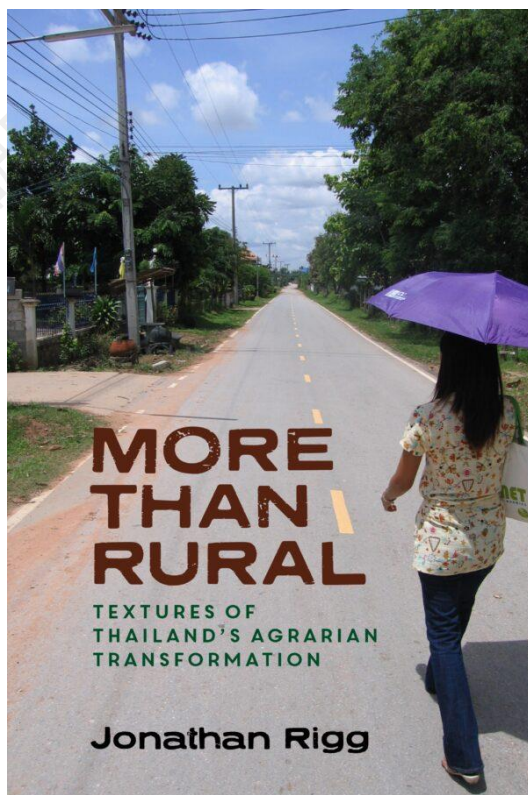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乔纳森·里格 (Jonathan Rigg) 《超越农村：泰国农政转型的肌理》 (*More than Rural: Textures of Thailand'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追踪现代化变革下的泰国乡村转型

编者按：本期我们选取的三篇文章，是包括作者乔纳森·里格在内的三位学者围绕《超越农村：泰国农政转型的肌理》一书展开的一组讨论。《超越农村》是乔纳森·里格教授关于泰国乡村发展的最新研究著作。里格教授系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人文地理学教授兼主席，对泰国乡村有着长达数十年的追踪关注，对其在泰国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在泰国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有着深刻思考。在本书中，他指出要从超越传统农村 (rural) 的视角理解当代泰国乡村 (countryside)。现代化中的时空压缩与连接性使得乡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闭塞、落后的农业空间，故而这种“超越”既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生产功能、社会组织、阶级结构等意义上的。

泰国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虎”，其现代化发展经验、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农业空间的转型对东南亚各国乃至中国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一方面为各国发展政策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案例，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周边国家的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处境，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发展合作中的相互理解。

除此之外，译介本组文章也意在展现当今东南亚研究中的比较与对话。通过两位学者对本书的评论以及里格教授本人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从事东南亚不同国家研究的学者对于同一问题的文化比较、理论思考，以及学者们在研究方法、材料安排、行文写作上的探讨。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主办期刊《东南亚社会问题杂志》（*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蒙特利尔大学地理系荣休教授罗多尔夫·德·科宁克（Rodolphe De Koninck）和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访问研究员、泰国研究项目协调员和缅甸研究项目联合协调员迈克尔·杰·蒙提桑诺（Michael J. Montesano）关于乔纳森·里格所著《超越农村：泰国农政转型的肌理》（译者注：农政（agrarian）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引自：叶敬忠、吴存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社会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的两篇书评文章和乔纳森·里格本人的回应文章。

罗多尔夫·德·科宁克的书评节选摘编如下：

在 2001 年出版的《超越土地：东南亚农村变迁》（*More Than the Soil: Rur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一书中，乔纳森·里格已就“家庭农场的顽强存续”（第 16 页）、“农村生活和生计的性质”（第 29 页）、“乡村工业化”（第 123 页）、“农村变迁和全球经济”（第 155 页）

等议题尖锐发问。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一方面参考了自己在泰国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则参考了其他学者的著作。

将近二十年后，他又回到了这些问题上。在此期间，他多次重访了 1982 年时最早研究过的泰国村庄，并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另外几个村庄，共计 17 个村庄。他还参考了其他研究者在泰国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所做的工作，包括一个大型国际研究项目“东南亚农政转型的挑战”（Challenges of the Agrarian Transi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ATSEA），更具体地说，这是他与同事们在共同编辑的《重返农村：东南亚通往贫穷与繁荣之路》一书中对这一课题的推进（Rigg and Vandergeest 2012）。这一次，他的问题和回答都具有洞察力。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简单的谜题”——“为什么泰国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和深刻的结构变革没有导致乡村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一个简单的论点”——“我们必须以超越农村的视角看待泰国乡村”（第 xv 页）。

全书共分十章，每章均围绕一个议题展开，章节标题基本都是一个词：“超越农村”、“继承”、“空间”、“繁荣”、“社会”、“土地”、“劳动”、“生计”、“阶级”和“未来”。但读者很快就会意识到，每章的内容都错综复杂，差别细微，需要细细品读。事实上，考虑到里格大量运用的泰国和非泰国数据以及他的解释，每一章都值得一读，他的解释大多基于前者，偶尔基于后者，往往两者兼而有之。

里格在导言中写道，“然而，在泰国乡村以及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地方（见 Rigg, Salamanca and Thompson 2016），小土地持有者和小规模土地（译者注：小土地持有者（smallholder）、小规模土地（smallholding）及后文中出现的家户（household）、农场主（farmer）、小农（peasant）和农夫（peasant cultivator）等译法参考了乔纳森·里格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所作《东亚与东南亚小农顽强存续之谜》的讲座资料。参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第 68 讲 乔纳森·里格：东亚与东南亚小农顽强存续之谜》，2015 年 12 月 4 日）仍是理论上的主流社会形态和经济企业”（第 3 页）。虽然这从根本上讲看似正确，但“其他地方”可能并不包括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半岛。因为在那里，种植橡胶和棕榈油的大型种植园已在乡村成为主流。不论是像泰国的小规模土地，还是大型种植园，完全商业化的农业都在整个地区迅速发展。遗憾的是，里格在分析泰国乡村的结构调整时，似乎没有特别考虑到商业化农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几乎完全服务于出口——这里指的不是水稻种植和出口。在本章的最后一段，里格写道：“在质疑农村作为独特空间、理论化对象和发展点的有效性和吸引力之时，本书

还认为泰国农村为观察当代泰国情况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第 14 页）。事实证明这一点非常正确！

“继承”一章的重点是过去的制度遗产、历史上对农村状况的看法以及学者们在试图分析这些情况时广泛采用的分类。“我们对农村生活和变化的解释受制于我们理解农村生活的方式：家庭调查、家庭民族志和村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记录和描述的经验世界建立在对泰国农村一系列或有问题的假设之上。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些基本的研究假设”（第 19 页）。里格随后对这些假设可能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有趣的讨论，但却回避了我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村庄的地理环境。村庄是充满动态的实体，书中没有一处对其研究的村庄进行了适当描述或绘制地图。似乎也没有考虑到村庄的空间布局和演变。为什么？难道里格认为测绘，甚至是历时测绘，都是过时且无关紧要的吗？

说到地点方位，第三章“空间”终于将一些研究的村庄纳入图中，清晰指出“家户不再是一个农村地址的坐标：家户的地理位置既是农村的也是城市的”（第 61 页）。这一点在第三章及整本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里格用图表“2016 年泰国东北部汶干府班南村的多点家户”（图 5.1，第 101 页）形象地说明了该点。虽然该图证明了这些家户的地理位置既是农村的也是城市的，但这并不能更清晰地表述出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和村庄布局的演变。无论探讨村庄有多么困难，正如里格反复强调的那样，这种困难都应该得到说明。“空间”一章还讨论了跨境空间的动态意义，即涉及合法或非国际劳工的空间。该章还涉及对农村和城市的解释这一同样复杂的议题，除了空间问题外，该章还讨论了一些其他问题——“城市在精神上塑造了农村，反之亦然，这对理论、政策和实践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第 64 页）。

里格的一个分析方法是兼顾局部视角和国家视角，这种分析做法通常非常清楚，有时则不那么明确。他在第四章“繁荣”只在国家尺度内进行了讨论，有效地总结了泰国从 1961 年至今的十二个发展计划的性质。他指出，“发展发生了变化，从国家只是间接参与的迫在眉睫的进程，转变为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项目”（第 72 页）。但他也同样指出，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而不仅是城乡之间日益相互渗透。“泰国农村正在成为一个后发展空间，即为边缘化和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提供发展机会不再是政府政策存在的理由”（第 82 页）。需要补充的是，这种趋势在马来西亚可能已经存在了更长的时间，而且正在东南亚的其他几个国家出现——印尼的情况尤为突出！为什么泰国也要这样做呢？

第五章“社会”的重点是家户及农业转型如何影响了家户的“社会归属单位”（第 96 页）性质。这意味着农业内部和外部的劳动要求和劳动关系有所不同，以及家户成员的社会流动性和空间流动性增加。为了说明这一点，里格在国家层面和“他的”几个研究村庄之间交替转换。“随着工作不再与村庄及其周边土地紧密相连，在更广泛的农村再空间化（respatialization）背景下（如第三章所述），家户实现了再空间化”（第 100 页）。“每年都有数百万泰国农村人口背井离乡前往异地工作....，但这些外出务工者并没有抛弃家庭、荒置家园或出售土地”（第 117 页）。这句话说得很好。我想补充的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马来西亚半岛的吉打平原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韧性（De Koninck 1992b），后来我在中爪哇也观察到了这种韧性的存在。

正如里格在第六章“土地”中指出，这种顽强存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写道，“小土地持有者是泰国的中坚力量（人们通常这样称呼他们），无论从他们在劳动力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他们显然都抵制了农场规模转变的必然逻辑”（第 118 页）。里格随后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重温了白馥兰的重要著作《稻米经济》（*The Rice Economies*, Bray 1986）。白馥兰在书中指出，水稻农业在农业生态学上不适合扩大规模。当然，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泰国，也适用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以家庭为基础的水稻种植虽然不是主流，但仍然很普遍。里格还提出了一些潜在的假设，这些假设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则不然，它们可以解释泰国和其他地区土地集中速度缓慢甚至几乎不存在土地集中的普遍现象。其中包括小规模土地在效率、生产率和环境可持续性上的优势，这些优势在水稻种植和其他形式的作物生产（包括几种经济作物）中都非常明显。里格还简要提到了土地边界的积极作用，在泰国，土地边界曾一度相当活跃，为小土地持有者提供了获得土地的机会。他可以指出，这一“逻辑”适用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

第七章“劳动”兼涉农业和非农活动，讨论了劳动这一基本问题。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被取代，这种现象甚至在水稻种植中也很普遍。例如，用手扶拖拉机来整地和运输。里格指出了整体工业化在城乡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和私营企业的鼓励，正在改变着自然和社会景观。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专业能力提升，以及需求和期望的增加，农场劳动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这就让人们产生了外出务工的想法，无论是打零工、打季节工，还是长期外出务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里格在谈到他所研究的几个村庄时写道，“小土地持有者无法仅靠农业耕作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他们的生计活动开始多样化”（第 166 页）。

因此，第八章的主题是“生计”，这是里格最喜欢的研究对象之一。在讨论生计的演变过程中，他终于就泰国东北部地区的景观进行了有用且值得欢迎的描述，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村庄都位于该地区：其中两个位于北部，另外两个位于大城府附近的中部盆地。在这里，他论述了土壤、气候、水文地理以及整体生态条件，农民们“在各种类型的土地上耕作，采取风险最小化策略”（第 175 页）。随后，里格探讨了“生计趋势、轨迹、过渡和动荡”，从而“质疑了去农政化这一看似无可辩驳的逻辑”（第 178-179 页）。里格颇有说服力地解释了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增长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如何促成了就业和收入多样化，从而使家庭农场和家户成为人们的大本营。例如，他正确指出，“不仅在家户之间，就连在家户内部，分化都在加剧”（第 179 页），一些家庭成员在农场仍十分活跃，另一些成员则在外充分就业，甚至长期不住在村里，但仍参与家庭财务。

里格在第九章中又回到了他选择的另一个研究对象“阶级”，这个对象更为复杂。他曾在《超越土地》一书中对此作过简要论述。在本书的前几章中，他指出了农村地区的耕作和劳动模式是如何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在他补充道，“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通常规模更大、资本更密集的农场主”（第 199 页），并进一步指出，“泰国的增长奇迹是在没有把小农从土地上赶走或者把土地从小农手中夺走的情况下实现的”（第 201 页），“实际上，小土地持有者没有被驱逐...这一事实...使这一过程更加有利可图”（第 201 页）。有趣的是，大致相同的进程在马来西亚也曾被观察到（De Koninck 1983; 1992b）。本章内还有一个让人期待已久且非常有用的表格（第 202 页），列出了里格研究过的所有村庄。表格题为“1982—2016 年泰国乡村的阶级结构”。遗憾的是，在书中唯一的地图上（第 12 页）很难找到其中几个村庄。至于表格，它详细列出了“阶级类型”，实际上是就业类型。这些类型涉及 14 个村庄，包括 20 多个类别，如农夫、水稻农场主、橡胶小土地持有者、农业雇佣工人、手工业工人、工厂工人、作坊雇工、小企业主、政府雇员、外出务工人员、外出家政工人等。这表明泰国农村社会的构成已变得非常复杂，移民和流动性已成为这种构成的核心。

里格在最后一章“未来”回到了他对农村领域的多面定义，坚持其快速演变的性质。这使他提出，在泰国，“农政转型已湮没在一代人的时间中”（第 229 页），或许应将其视为一个转型过程，而不是向特定状态的过渡。他补充道，在尝试想象未来时，可以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的特点是“土地整合、现代化和农村退出”；另一种情况则是“小土地持有者的顽强存续和分布式生计”（第 230 页）。关于第二种情况，他参考了塔尼亚·李的一些研究成果（Tania Li 2010），指出我们应该“不是将农村人口视作投入、资本或劳动力，也不是为了他

们的什么用处或是生产上的潜力，而是将他们作为人…。当我们这样做时，就会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家户紧紧抓住他们‘不经济’的土地，在商业化非农就业的同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耕作”。（第 231 页）

里格的目标是试图更好地展示泰国乡村演变的强度和复杂性。虽然他对农村和城市、村庄和家户等概念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抵制住了试图使这些概念失效的诱惑。这使他和我们都能更好地把握泰国农政转型对农村乃至整个泰国所带来的挑战。事实上，里格指出分析农业（尤其是小规模农业）的顽强存续以及农村地区错综复杂的性质，对理解泰国乃至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转型都至关重要。

迈克尔·杰·蒙提桑诺的书评节选摘编如下：

首先，里格对一系列相关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而知性优雅的回答，这些问题涉及“泰国农村在渐趋衰落之时仍具有突出地位这一悖论”（第 221 页）。他将这一悖论解释为一个“谜题”：在一个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城市化的社会和一个农业的作用越来越小的经济中，泰国土地上的小土地持有者的数量却只增不减，“数百万家户”仍与耕作和乡村保持着联系（第 1 页）。社会变迁和经济变革未能切断这种联系，这对了解泰国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一失败的潜在动力，就像农村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依然突出一样，显得难以把握。里格提出了一个系统而有力的论点来解释这些动力。

《超越农村》通过各章节的词语标题阐述了这一观点：空间、社会、土地、劳动和生计。总结一下，尽管可能会因为过度简化而出现曲解或失真的风险，但里格表明，我们必须了解泰国的“农村”家户组成和依赖于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无论是在城市环境中还是在远方的非农业工作中。即使家户中那些仍然“家在村里”的成员，他们也会将相当大的一部分活动投入农业以外的工作。他在“社会”这一精彩章节中对农村家户进行了细致观察，这在此至关重要。在随后的章节中，他继续指出这些家户通常保持并耕种他们的土地，尽管有时在面对家庭劳动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可能会降低土地的密集度。

这种经济活动模式与当前官方竭力实现“泰国 4.0”的愿景难以协调。但在里格的论点中，这反映了数百万泰国家户岌岌可危的处境，以及他们不愿放弃土地所代表的细微安全感。此外，它将家户成员的身份认同根植于农村人，即使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泰国村庄”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经历了全面重塑。

该论点及其组成部分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赋权了泰国生活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使他们能够理解他们将遇到的许多事情，作为更广阔图景的一部分。里格为他的读者提供了一面透视镜，让他们能清晰且综合地审视泰国大部分人的生活选择、实际经济策略、家庭和职业规范，甚至是对自己和自己生活状况的感知。在个体层面上，虽然这些选择和规范对学者和有泰国社会经验的人来说都很熟悉，但里格的杰出之处在于他解释了它们如何紧密地融入一个连贯的整体。

在阐述这一解释时，里格做得不错。《超越农村》一书中关于各种田野调查的段落是最有价值的。例如，书中两次提到中部（Central Plains）大城府的一个地方，那里基本上成了附近工业区工人的宿舍区。里格将该地区视为一对“村庄”（第 49 页），因为他阐释了农村与非农村之间模糊的空间区别、服务业的新生计机会（即使在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地区之外）以及不断变化的阶级现实。坚持使用“村庄”这一标签是明智之举，它让里格以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利用“泰国村庄”这一或许极端的案例，让读者直面当代乡村“超越农村”的特质。里格对大城府这一背景的处理，让人注意到他善于运用田野调查结果的另一面。他将泰国乡村视作一个整体，强调其论点与泰国所有地区的相关性，而不是将这些地区分隔开来。这一明智的选择让论证富有力量和说服力。

与此同时，许多《超越农村》的读者在阅读里格的书时可能会想到泰国东北部的伊善地区（Isan）。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者在本书封面上选择了他拍摄的一个明显属于泰国东北部场景的照片，并在序言中叙述了他于 1982 年开始在玛哈沙拉堪府进行的泰国农村的早期田野研究。很难忽视的是，里格在伊善的关键经历很可能塑造了他对泰国乡村更普遍的感性认识。但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在近几十年来的曼谷——不幸的是，许多关心泰国的人都在那里花费了大部分时间——那些生活经历反映出“泰国农政转型的肌理”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泰国东北一带的人。许多《超越农村》的读者因为熟悉这些肌理而会发现这本书的论点令人信服。里格成功地将这一论点同样令人信服地应用于整个泰国。

里格在本书中巧妙定位了泰国首都本身——曾贴切地被人称作“世界上最重要的首都城市”（Sternstein 1984, p. 43）。令人惊讶的是，他鲜少提到曼谷的名字。他无需这样做，因为他告诉我们，“思考泰国农村时，不可能不想到泰国的城市”（第 64 页）。无论是否有明确提到，曼谷总是存在于思考的画面中。但里格确保人们总是从乡村的角度看待这幅画面，这点非常出色。

《超越农村》成功和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以某种方式反映了泰国和整个泰国社会的当前“肌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泰国“农村”和“城市”的生活交融意味着“超越农村”的有关批判并不令人惊讶。但具体的批判取决于它的说服力，取决于书中核心章节为读者提供的视角。简单来说，这一批判的观点是泰国的“兼职农民、零工小农、短期工厂工人、出租车司机和家政帮佣”与小规模土地的关系，他们的就业、生计选择以及持续存在的农村身份，实际上根本不是泰国农村的功能（第 216 页）。相反，它们的出现是因为“非农业工作的不稳定性”和“结构性鸿沟”，这仅仅为极少数的泰国人提供了良好机会（第 216 页）。泰国的问题并不需要“农村问题”的修饰，而就是一个单纯的问题。

本书的前半部分介绍了里格的批评，该批评根植于对泰国 1959 年以来的“发展计划”的抨击（第 67 页），它显得粗枝大叶、缺乏细化，以及令人不太满意的反事实。里格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超越农村》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泰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处理还不够复杂。无论如何，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导致泰国社会当前状态的路径比状态本身更为重要。

出于同样的原因，《超越农村》对理解泰国乡村知识史的处理不当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里格对“社区 (community)”概念在泰国农村的应用和对社区文化 (watthanatham chumchon) 学派的讨论是简短、肤浅和相当勉强的（第 20-21 页），社区文化学派则同差替坡·纳苏法 (Chatthip Natsupha)、他的门徒和他的崇拜者相关联。里格对 1970 年之前进行的村庄研究中对“泰国村庄”的理解进行了仔细检查，这令人钦佩，但也有点令人困惑。它涉及了外国人进行的研究和英文出版成果，尽管里格确实引用了威廉·格德尼 (William Gedney) 对阿努曼·拉查东 (Anuman Rajadhon) 的一些摇椅民族志的翻译 (Anuman 1955)。

可以肯定的是，在《超越农村》成功阐释农政转型之前，这些早期研究反映并塑造了几十年来外国学者对泰国乡村的理解。它们可能也反映或塑造了一些泰国学者的理解。此外，里格确实需要一根“基线”，以便对比变革进行记录。但不清楚外国和泰国学者的理解会对里格该书的论点有何贡献，为什么它们真的很重要？据他表明，这些外国学者的思想——不像泰国计划机构的技术官僚、大都会官僚、商业精英、保皇党和地方商人的行动——对转型的历史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实际上，这个谜题导致了另一个谜题的产生。《超越农村》的三十六页参考文献似乎只列出了一个泰文条目——这恰好是一篇专门为里格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写的期刊文章 (Songchai 2013)。在三十多年的泰国农村研究工作中，里格肯定从泰文书籍、文章和报告中获得了无数的见解。他为什么不引用一些呢？

明智的是，里格没有让有关“泰国村庄”或“小农”性质的学术争论困扰他。他将这些术语作了常识性处理，这十分有益。正如他在《超越农村》的后半部分界定的那样，他使关于泰国农村“大部分人口”生活不稳定性的观点变得有说服力（第 213 页）。里格认为，人们共享的不稳定性比个人之间不可否认的差异更重要。这种不稳定性在人们之间形成了“重要的共同阶级认同感”，无论他们是留在了乡村还是在城市住了几个月或几年（第 220 页）。在强调不稳定性方面，《超越农村》基本上是一本政治性的书。然而，它只有一段内容具有明确的政治色彩，这段内容将提及的“阶级认同”与过去 15 年的红衫军联系在一起，这使得里格的思考与费德里科·费雷拉（Federico Ferrara）强调泰国集体认同的观点非常相似。遗憾的是，《超越农村》没有直接联系到费雷拉《现代泰国的政治发展》（*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Thailand*）中关于这点的论述（Ferrara 2015）。

除了以上两个成功之处，《超越农村》中还有无数机智、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见解，这使得该书脱颖而出。其中的许多见解都支持了它的主要论点。其他见解也将为研究人员提供灵感。在这样一个简短的书评中，很难充分评估这些见解的价值。

然而有必要指出，尽管《超越农村》一书思想深刻、优雅且有价值，但其论点呈现的若干方面不但分散注意力，甚至似乎体现了作者在这种呈现方式上有些信心不足。例如，为了确保读者知悉泰国案例与东南亚其他地区、亚洲以及“全球南方”之间的相关性（如第 119 页和第 185 页），里格多次在行文中停顿。这种做法频繁而多余，使人想知道为什么不在书中设置一个恰当的比较章节。

里格教授对以上两篇书评做了回应，全文节选摘编如下：

迈克尔指出一个不足，他认为《超越农村》“基本上是一本政治性的书”，但又指出，“只有一段内容具有明确的政治色彩”。这既是在说迈克尔本人，也是在说我自己。我想解释一下，我希望政治可以独自细语。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沉淀的证据，即直白的事实和数字以及农民和工人的声音能为我完成政治上的工作。在这本书中，我想揭示农民的行动与政府政策之间的解释性差距，以及农民在多大程度上没有遵循政治剧本，没有被政治和政策裹挟。面对农民的行动和不作为，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不得不重新调整和计算他们的假设。这当然也适用于我自己的工作，在我的工作中，事实常常证明我对错参半。换句话说，是农民迫使我在解释方面迎头赶上，而不是知识界的风靡潮流或政策路线。

因此，我在这本书中不仅想探讨政策做了什么，还想探讨政策没做什么——我的解释方向是从农场、农民、农户和村庄转到国家机构和政策，而非反其道而行之。曼谷是国家的中心，也是国家各大部委的所在地，从这里看，农村发展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从稻田和农舍的方位来看，农村发展就是一个农业问题，而农业就是早起的清晨、漫长的一天、辛勤的劳作、高温、泥土和汗水。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以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的一句话作为开篇，在写下这篇回复时，这句话又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人比他的化学成分更有价值，他在土地上走着，调转犁头，让开石块，按下犁把，滑过泥土里冒出来的石头，他跪在地上吃午饭；本身的价值超过体内的化学成分的人，知道土地的价值也超过他的化学成分”（Steinbeck [1939] 1972, p.117），这是多么精彩的论断。

迈克尔写道，“令人惊讶的是他鲜少提到曼谷的名字”，但是“无论是否有明确提到，曼谷总是存在于思考的画面中”，而且是“从乡村的角度看待这幅画面”。这完全体现了我所追求的目标，也解释了政治为什么会退居幕后。当然，如果是其他人，如果没有我的经历、学科背景和方法论偏好，就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背景下向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问题。

罗多尔夫和迈克尔都在思考“其他地方”。对于罗多尔夫来说，这个“其他地方”是马来西亚；对于迈克尔来说，是泰国南部。他们用自己从其他地方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检验这本书的论点。换句话说，这个论点是否适用？罗多尔夫多次在文章中以他长期深入参与马来西亚的类似辩论和过程来衡量我的论点。有时，他觉得这些作品不尽如人意，有时却能引起共鸣。这正应如此。和他一样，当我自己身处河内近郊的乡镇、老挝高地的苗寨或尼泊尔特赖（Terai）的聚居地时，我发现自己也在不断追问：这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为什么？这对人类福祉有什么影响？因此，泰国、伊善、“我的”村庄，这些家户和个人都是特殊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也成为研究的范例。迈克尔写道，我“在伊善（Isan，泰东北地区）的关键经历塑造了我对泰国乡村的感性认识……（而且）难以忽视”，他的说法完全正确。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在 1993 年至 2013 年期间在主流的英国杜伦大学地理系工作，它们没有泰国的专业知识，更不用说东南亚了。要把这些田野点当作地点（place）来研究，系里兴致索然；同事们只是把诸国当作各种过程（process）发生的地方，讨论这些过程的是是非非。

对罗多尔夫和迈克尔来说，学科上的分野是地图和政治，地区上的差异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南部，领域上的不同则是水稻和橡胶以外的农业体系。虽然罗多尔夫问道，我的书中没有地图是否意味着我认为它们“过时且无关紧要”，但迈克尔却认为我在南方材料上的缺失“明

显缺乏对南方的熟悉和兴趣”。正如我看重一张好地图一样，我当然对南方很感兴趣，但迈克尔说得没错，我对南方并不熟悉，这一点我在书中也承认了。但是，我希望这一点也能体现出来，我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及其中产生和可能产生的东西。我认为，这能让我保持诚实。这解释了我对经验材料的重视和我对某些学术研究缺乏数据所感到的不适，也解释了我过去（现在仍然）受到的批评，即我的研究工作理论性不足。我曾游历过南部地区，并在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后在那里（甲米和攀牙）进行过一些田野调查，但我还没有在那里进行过更深入、更深刻和更实质性的考察。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写了这篇回应文章，新冠疫情影响了各种研究工作，至少对我来说，“亲临现场”已不可能。在对来自孟加拉国、老挝、缅甸、新加坡和泰国的四十四名不同背景的务工人员进行线上访谈时，我和合作研究者都对这种方法产生的高质量信息而感到惊讶。我感觉我也需要重新考虑方法论。

在迈克尔的评论接近尾声时，他提出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时“为了确保读者知悉泰国案例与东南亚其他地区、亚洲以及“全球南方”之间的相关性，而在行文中停顿”。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强调泰国本身很重要，我试图在《超越农村》中指出为什么泰国也可被看作范例。这也是我将“泰国”移到副标题中的一个原因。我抱着一种幻想：对泰国不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想读我的书，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参考文献省略，请参见英文原文。

（英文原文见 De Koninck, Rodolphe, Michael J. Montesano, and Jonathan Rigg. “SOJOURN Symposium on More Than Rural: Textures of Thailand’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35, no. 3 (2020): 525–46, 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郭迅羽

编译：李庚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